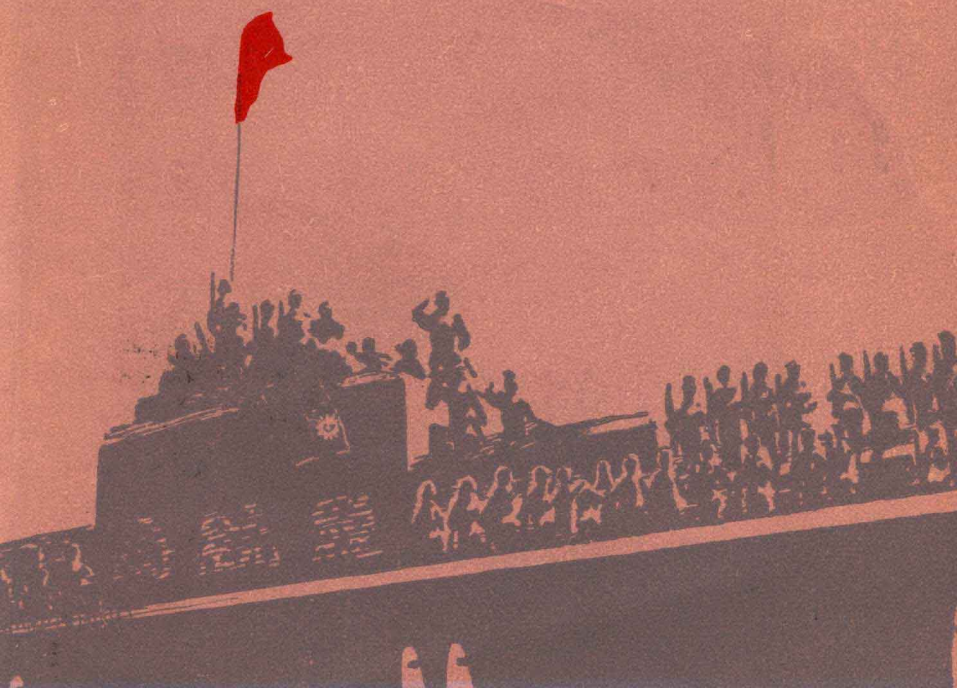


南京党史資料

4

总第十五辑

1986



南京党史资料

一九八六年第四辑

(总第十五辑)

南京“一二·九”运动资料专辑

人民财产，注意爱护，
遵守纪律，按期归还。

南京工学院

分类号 _____

登录号 _____



▲ 南京秘密學聯：委之一祁式潛同志

▲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南京大中学生通电全国声援华北学生爱国运动

南京學生

——二卷二期——

編者致函
 怎樣發展北平團體的組織
 各團體的救亡
 第一區
 第二區
 通訊集
 一個警人的消息(徐州通訊)
 留在南京(足葉)
 長江通訊
 環湖山上的救亡運動(尹波)
 本報通訊
 政安民衆的呼聲(同安通訊)



借書辦法
 總部第三四五六次會議
 會計部告
 南京學聯總執行部秘書處編印 215

▲ 南京學聯編印的刊物《南京學生》及插图

编 者 的 话

在去年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的时候，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共青团南京市委员会、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邀请了当年在南京参加“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开座谈会并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根据这些老同志的建议，会后我们将有关南京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和南京秘密学联的回忆资料和文献资料收集编印成册，以资纪念。

目 录

回 忆 录

- “一二·九”运动和南京秘密学联……………后爽斋（2）
- 再谈南京秘密学联和党的领导问题……………李 庚（6）
- 关于“南京读书会”的情况……………薛葆鼎（10）
- 南京“一二·九”运动散记……………方璞德（16）
- 南京秘密学联——南京学生界抗敌后援会——首都平
津学生救亡宣传团……………陈 莹（19）
- “一二·九”时期的南京学生运动……………李 广（31）
- 回忆“一二·九”前后的南京学运……………蓝毓钟（34）
- 关于南京秘密学联的两个情况……………孙运仁（42）
- 一九三五年前后在南京参加读书会、秘密学联
的情况……………夏 林（45）
- 走出象牙之塔……………冯法祀（49）

革命的路程从这里开始·····	林 琼 (53)
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沙轶因 (59)
抗战前我在南京参加的进步活动·····	黄培炎 (63)
跋山涉水为找党·····	潘铮序 (69)
南京学生运动的“复活”·····	李 文 (74)
留恋南京·····	吴 汉 (80)

人 物 介 绍

忆祁式潜同志在南京的革命活动·····	胡叔度 (83)
怀念胡永萱·····	胡 畏 (92)

诗 二 首

怀金陵老友·····	李 庚 (103)
金陵聚会 旧雨新知·····	李 广 (103)

文 献 资 料

新的组织与新的工作 原 则(一九三七年一月)·····	(104)
怎样发展并巩固我们的组织(一九三七年二月)·····	(109)
新的任务与工作方式的检讨(一九三七年四月)·····	(115)
论我们的 阵 线·····	史 纲 (123)

“一二·九”运动和南京秘密学联

后 奕 斋

我原在安徽芜湖中学上高中，因在校内经常对国民党的奴化教育不满，学校要开除我，后来设法转学到南京白下路安徽中学读书。在校时，我曾看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等书籍。

一九三三年，我参加了世界语学会，以后才知道这是党的外围组织，在这里面，我认识了季钟璞、汪灼华(又名汪光焕)、翟毅和孙克定(钟南中学的教师)。孙经常对我们说，光学世界语不行，还应该学点哲学。我们常在他家里学习，读了李达的《唯物主义大纲》等书。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我们搞了一个反对会考的运动，各中学都参加了。安徽中学选我做代表串联各校，后来各校推举我做总纠察，防止破坏反会考。以后，我被社会局抓了起来，各个学校都有人被抓。社会局把我们安徽中学的三个同学关在雨花台的一个庙里，门口有宪兵站岗。在我们被保释出来时，同学们放鞭炮欢迎我们，孙克定说我们表现很好，没有乱说。

一九三四年暑假，我考进了中央大学工学院，在图书馆里看书，看到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我在中大与薛葆鼎是同班同学，也经常见到季钟璞。以后，我们又串联了其他院系一些同学，如郭弗述、林家旅、徐荃、蓝毓钟等。不久，我们又和李赓（李庚）、祁式潜及金大的胡笃宏等取得联系并一起参加活动。一九三五年，孙晓村、狄超白等文化界人士搞的活动很多，我们常和孙晓村、狄超白、杨帆、曹孟君一起参加活动。我们到过孙晓村、千家驹的家，当时千家驹正在翻译《资本论》。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薛葆鼎曾带我去无锡参加万方楼会议，但没能赶上。后来，狄超白给我看了中文版巴黎《救国时报》上登的“八一宣言”，知道了党在抗日问题上的主张。狄超白曾告诉我，没有共产党参加，抗日工作是搞不起来的。他曾带我去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参加一些有关抗日的会议。

北京学生“一二·九”游行之后，我们南京有过几次大的行动。南京的游行请愿活动，开始是由中大工学院发起的。我们中大许多同学接到北京学生的来信，了解国民党镇压学生的真象，我和蓝毓钟等商量后，便发动全校学生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校长罗家伦知道后，和叶楚傖一起冲进会场。我正在对同学做宣传鼓动工作，罗家伦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不理睬他，我冲着罗家伦喊道：“你难道忘了你参加过‘五四’运动？”那天，中大同学情绪非常激动，大家决定第二天游行。

第二天，我们到行政院游行请愿，大家推举了三十多位代表进去，我也是代表之一。翁文灏接见了我们，讲了几句不着

边际的话，外面学生的口号声响成了一片。那天，狄超白也在外面观察学生的动向。还有一次，我们中大学生准备上街游行，一个同学爬到钟塔上打钟，集合队伍，这时，国民党的军警宪兵赶来包围了我们，他们在枪上上了刺刀，如临大敌。最后，我们只好在两排刺刀组成的甬道中走回了宿舍。

一九三六年初寒假期间，北京学生骑自行车来到南京，宣传“一二·九”运动。他们在花牌楼的长安旅馆住下时，就被宪兵抓了起来。我们中大同学赶去营救时，军警宪兵把一些中大同学也捆起来抓走了。我立即赶回学校，鼓动同学说“政府不抗日，反而压制学生”。有的同学就提议去冲警备司令部，我说教育部就在成贤街，我们去教育部。于是我们集合了二、三百个同学到教育部，大家喊口号，要见教育部长王世杰。后来教育部总务司长雷震出来接见，我们都不理睬他。那天晚上，军警把逮捕的学生释放了，将北平学生南下宣传团押上火车，送了回去。

这年三、四月间，经我的一个中学同学金乃华的介绍，陈国栋到南京来找我。他穿了夹袍、布鞋，装成小商人的样子，在中大找到我时，说有空要和我谈谈。一天，我们在玄武湖划船，谈了整整一天，从国际谈到国内。陈国栋提出他要和学生界、职工界的几个读书小组成员谈谈，我就介绍他去了，之后，他告诉我，他是和共青团江苏省委有联系的。陈国栋认为我们搞的活动太“左”了，太神秘了，说读书不一定非学马列主义，也可以读一些其他的书籍。我要求入团，陈国栋说：“我回去商量一下，然后发展你，批准以后，就由金乃华和你联

系。通信可以用密写药水写”。以后，金乃华给我来信说，某某人认为你很好，同意你转“学”，但“学习”要注意。用的是隐语，说明批准我入团了。

一九三六年，我们各校代表成立了学联，成立会是在李庚家里开的，还请孙晓村讲了国民党的腐朽，以及C·C系、黄埔系、政学系如何反动。那时，他要我了解国民党在学校里的反动组织。在这期间，孙晓村还带我去中央饭店，见过沈钧儒、沙千里等人。由于我公开活动太多，在学校待不下去了，我就和孙晓村商量，是不是转学。孙认为我不能离开南京，就在下半年介绍我到学艺中学去教书。这时，我和中大切断联系，而在学联内部做联络工作，联系了中央政治学校的刘慈元等人。

当时秘密学联曾油印了党的“八一宣言”，是李庚、李庶兄弟在家里刻印的。九月底、十月初，我给了刘慈元一些油印传单，他放在口袋里。打篮球时，他把衣服放在宿舍里，结果传单被一个特务学生拿去了。刘慈元发现传单没有以后，就把这个情况告诉我，我说：“你不能回去了。”后来，我把他送到了阎宝航家里，阎的女儿是我们学联的成员，我们准备把刘送到上海去。后来刘慈元打电话给他的亲戚，问他家里有什么情况，那人说没事，刘就回家了，结果被敌人抓走了。

这时，孙晓村派我做为南京学联驻全国学联机关的代表，和北大的刘江凌、南开的吴祖贻住在一起，同时接上了共青团的组织关系。我们经常同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有工作上的接触。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们同沈老等在功德林素菜

馆开会到深夜。第二天清早，有人到全国学联机关告诉我们，上海“七君子”被捕了。不久，南京救国会也出了问题。听到消息以后，刘江凌、吴祖貽和我决定暂时分散活动。我立即回到芜湖老家。两个月以后，祁式潜来找我，不久我又去了上海，那时，只联系上了全国学联的吴祖貽、刘江凌和共青团的金乃华。五月初，我从上海到了北平。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我从北京回到了南京。这时，沈钧儒已出狱，他叫我去安徽工作，我碰到了李庚、祁式潜、胡笃宏等人。以后章乃器在六安任安徽省财政厅长，我又去那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参加了新四军，一直战斗在抗日前线。

（陆庆良、蒋晓星访问整理）

再谈南京秘密学联和党的领导问题

李 庚

一九八四年中央组织部发的22号文件，确认“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南京秘密学联是党领导的革命团体，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自一九三四年八月以顾衡同志为负责人的南京市委被国民党破坏，到一九三七年八月由李华同志负责重建南京市委，在这整整三年期间，南京没有党的组织。那么，为什么说南京秘密学联是党领导的，南京秘密学联又是如何接受党的领导的呢？我想再谈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况。

第一，任何时期、任何地区革命运动的兴起及其发展，除了有当时的形势和历史条件以外，还要有一支先进的革命力量作为发动和坚持革命运动的核心；而这一力量的形成，首先是要有先进的革命的思想武装，这对于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尤其重要。回想我们当年在南京发动“一二·九”运动和组织的秘密学联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在运动以前，就已经接触了马

列主义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马列主义理论的认识的。我们只有得到了革命理论的武装，才会有“一二·九”时期那一段的革命行动。我们当时学习和接受革命理论，有青年人为国家、为个人寻找出路的原因，也有受当时党的斗争和左翼文化影响与启发的原因。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南京地下党就以组织读书会的方式，对相当数量的青年学生进行了革命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曾任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汪灼华和党员翟毅先后组织过几个读书会，我、祁式潜、朱启统、陈文治、郭浩、王家珍、罗晋元……这些后来在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都是受他们的启蒙而成长起来的。后文瀚、季钟璞则参加过党员孙克定领导的读书会。曾经对建立南京各界救国会起很大作用的“南京读书会”，也是通过王昆仑、狄超白、汪楚宝这些党员组织起来的。南京秘密学联筹备的第一步，就是先在各学校组织进步学生的读书会，进行革命理论学习，这些读书会的成员以后都成为秘密学联基层的骨干。从这一情况来看，党曾以革命理论教育和培养了一批力量，使他们奠定了革命的思想基础，这就是从革命理论上体现了党的领导。

第二，当一九三五年革命学生运动掀起新的高潮时，党的“八一宣言”已经传到南京，以后我们又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其中有的是从秘密文件、公开的救亡刊物上得来的；有的是从全国学联、全国救国会、民先、北平学联方面得来的；有的是从南京秘密学联中的成员与上海、北平个别党员的联系中得来的。现在回过头来检查一下南京秘密学联的工作，在总体发展和掌握上，基本上是正确的。

的，没有大的失误，这是和当时能够及时得到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分不开的。

第三，南京救亡运动的兴起，各救亡团体、南京秘密学联的组成，是以南京地下党留下的革命力量为骨干的。在南京市委被破坏前，汪灼华、翟毅两同志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南京中学、安徽中学做了大量的工作，又发展了一些共青团员，团结了一批革命先进份子。狄超白、汪楚宝、孙克定也一直坚持革命工作，影响和团结了一批各界的革命同志。“南京读书会”也是一条线。“一二·九”运动前后，这些力量重新集合起来了。因此，我认为，南京的革命运动在这个时期重新兴起，是党播下的火种，从被迫分散到再聚集的结果；是各路英雄大聚义，而不是哪个山头独打天下的结果。没有党过去的工作，没有党教育出来的人，没有党撒播的革命火种，要造成一个新的局面，是不可能的。当年南京的救亡运动，南京秘密学联的活动，从实质上说，是南京地下党被破坏后革命工作的延续（当然又有新的发展）。

第四，南京秘密学联自筹备到成立以后，一直通过各种关系间接地得到了党的领导。在我写的《抗战前南京秘密学联的情况》一文中，曾列举当时我们和党发生工作联系的十一条渠道。按照当时白区工作的困难条件和地下党的工作方法，我认为，象我们当时那些联系，也就是和党发生工作联系的一种方式。党的领导，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体现的。

此外，关于南京的“一二·九”运动，我认为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是公开的群众运动阶段，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

八日南京学生大游行起，至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南京中学学生包围日本大使馆示威为止。第二段，是一九三六年八月南京秘密学联成立至一九三七年学联骨干被捕为止，这一段主要是发展骨干组织，并结合开展分散的公开的活动。第三段，是“七·七”抗战爆发后，以秘密学联为骨干，建立南京学生抗敌后援会，进行公开的抗日救亡活动，直到南京沦陷之前。

关于“南京读书会”的情况

薛葆鼎

在三十年代，以王昆仑、孙晓村为核心的“南京读书会”所起的作用是比较突出的，它对国民党上层各派系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对中央大学的学生运动和中央医院等单位的职工运动作过指导，对南京文化界、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作了组织和宣传工作。

从一九三三年孙晓村到南京协助王昆仑主持“南京读书会”之后，它的活动开始正规化。每星期六晚定期进行国际、国内的时事分析，有计划组织成员阅读《唯物辩证法入门》、李达《政治经济学教程》，并以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读书月刊》、《世界知识》等书刊作为辅助读物。一九三四年夏我借宿成贤街无锡同乡会投考中央大学时，即曾两次参加读书会的活动，当时见到的成员有：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汪楚宝、顾清侣、吴茂荪、王枫、胡济邦、薛葆宁、吴元成等。

一九三四年八月前后，顾清侣被捕，由王昆仑等保释出来并

与汪楚宝一块逃离南京。后来胡济邦出国了，吴元成到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去了。从一九三四年秋到一九三五年秋，我曾多次参加“南京读书会”的活动，经常见到的成员有：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狄超白、吴茂荪、王枫、薛葆宁。大约一九三五年春以后参加“南京读书会”的还有季洪(季宗伟)、袁轶群、汪德彰。

在一九三四年夏我到南京上大学之前，听说参加“南京读书会”的成员有钱俊瑞、张锡昌、孙克定、华应申、陈洪进、秦柳方等。据王昆仑说，最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就在为民族危机而苦闷，一九三二年他见至亲好友王枫、汪楚宝等都在搞学生运动，而他这个“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却站在学生运动的对立面，即国民党政权方面，使他深受刺激。他在认识到国民党对日屈膝投降、对内反共高压政策绝无出路之后，才在无锡莹桥巷钱俊瑞家夜访钱俊瑞，决心从组织读书会着手寻找革命真理。其后，一九三三年孙晓村到了南京，才帮助他把“南京读书会”引上了轨道。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秋，“南京读书会”的领导核心虽无固定形式，实际上是以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狄超白四人为主。在无锡同乡会和傅厚岗2号王昆仑寓所活动的一组，就是一九三五年夏南京、上海、无锡三地读书会主要成员在无锡太湖别墅万方楼开会时南京方面的主力，他们后来分工负责筹备各界救国会。这时，王昆仑要在国民党内各派系间做上层工作而退居第二线，但仍与孙晓村、狄超白、曹孟君、薛葆宁和我保持个别联系。孙晓村、狄超白分工负责筹备南京文化界救国会，曹孟君(以季洪为助手)分工负责筹备南京妇女界救国会，